

池万兴 著

先秦文化 和《管子》研究

■ 孔子的贫富道德观及其对
民族性格的塑造

■ 论《管子》的法家思想

■ 《管子》的治军思想浅探

■ 论《管子》的民本思想

及其治国实践

■ 论《管子》中桓、管遗闻

轶事的传记文学价值

■ 试论庄子的人格结构



人民出版社



先秦文化和《管子》研究

池万兴 著

责任编辑:贺 畅

责任校对:史 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文化和《管子》研究/池万兴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5

ISBN 978-7-01-014519-8

I. ①先… II. ①池…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先秦时代②法家
③《管子》-研究 IV. ①I206.2②B22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35790 号



先秦文化和《管子》研究

XIANQIN WENHUA HE GUANZI YANJIU

池万兴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市大兴县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4.25

字数:197 千字

ISBN 978-7-01-014519-8 定价:3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赵逵夫

先秦文史哲的文化渊源是一致的。无论是三代的文化典籍还是春秋战国的文献，无不充分显示出文史哲浑然为一的本真状态。它们是互为根本的人文存在，也是尚未发生“道术将为天下裂”之前的文化共同体。譬如，孔子、老子，既是中华儒道文化的始祖，又是影响中国几千年思想的哲学大师和历史巨人，以他们的名义流传的著作（学生后学编订）被奉为最重要的经典，开启了一代代学人的智慧，也影响了一代代学人的意识、作风与文风。无论是《论语》，还是《老子》《春秋》，不仅是哲学名著、史学典范，也是文学范本。即便《春秋》这一史学著作，也深深地融入了孔子的思想观念，表达了儒家平治天下的意识。其“微言大义”的表现技巧与“春秋笔法”的褒贬色彩，既是哲学思想的巧妙表达，又是历史意识的体现，对后代有很大影响。《庄子》《管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无不是文史哲浑然一体的典范。尤其《管子》一书，可能有管仲的遗文，也有其后学的著作及有关管仲言行事迹传说的记述，但大部分是战国田齐时代自称为“管子学派”的稷下学士的论著，均统统归于“管子”名下，用今天的话来说，“管子”似乎成了当时“齐学”的一个符号。

管仲不仅是思想家，也是政治家、治国的能人。他不可能如后世的儒家只讲仁义礼智，更不会像儒家那样支持、维护宗法制；他不可能如道家倡导的“无为而治”，更不会否定国家机构的功能和完全否定礼仪制度；他不可能如后期法家那般严刑酷法、刻薄寡恩。他不主一家，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不是坐而论道，而是一位对历史上的治乱成败有深

人思考又视野开阔、无所拘束的人。从他辅佐齐桓公强齐称霸即可以看出这一点。齐稷下学者正是从这一点上，根据自己的学术特长与基础，从各个方面探索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出相关理论，设计相关方案，以用于强齐富国和统一天下，但都以“管子学说”、“管子学派”名义冠之。所以，《管子》一书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带有综合性的诸子著作。秦统一前夕，吕不韦组织文人编了一部《吕氏春秋》，本意是想作为七国一统之后用以统一意识形态的著作，但秦始皇“以吏为师”的办法比他更干脆利落。大汉帝国建立，休养生息，在消除了数百年战乱和暴秦造成的社会创伤之后，淮南王刘安组织人编著《淮南鸿烈》（即《淮南子》），也希望在意识形态领域有“一统天下”的典籍，但汉武帝却用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比刘安的设想更彻底，标准也更明确。《管子》一书同后来两部融合百家之书的《吕氏春秋》《淮南子》的命运一样，对齐国的治理未能发挥作用。这是因为统治阶级根本不考虑总结继承前代文化，怎么便于统治怎么来。但《管子》作为包含先秦各家思想的重要典籍，为研究先秦政治、经济、文化留下了大量珍贵的资料，而且其中有些内容与其他诸子典籍不曾涉及的领域。

笔者以为从事三代秦汉学术研究的人，应具有文史哲兼通的素养和功底。研究文学的人不仅要有哲学的思辨精神和深邃内涵，也需要历史意识与历史眼光。要以文史哲的相互会通，救当今学术研究的壁垒偏弊。学术研究需要大处着眼，固本培元，率然一体。同分种分类的细化研究比起来，这样会取得过细的专门之学不能获得的成果。

万兴同志的《先秦文化和〈管子〉研究》一书收录了二十多年来的有关论文 22 篇，分为五辑。第一辑 4 篇文章探讨中华远古文化的特点及精神实质。《论旧石器时代中华远古文化的创造精神》一文，从氏族的萌芽、墓葬出现的意义与原始审美观念的产生三个方面探讨中华远古文化的创造精神。文章认为，人类经过上百万年的艰难探索之后，思维能力、探索精神与创造精神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中华民族正是在这种探索与创造精神的鼓舞与推动下不断进步与发展的。《从考古资料看新石器晚期社会的巨大变革精神》一文，从占卜、巫术和贪欲的出现等三

个方面探讨新石器晚期社会与文化的特征。作者认为，新石器晚期随着贪欲与权力欲的出现，早期人类那种和谐、淳朴、安宁、静穆的社会氛围被彻底打破了，贪欲与权势欲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宰，社会的文化心态则表现出对于粗犷、狞戾之美的赞颂，对力量与威武的讴歌，对权力与财富的崇拜。而这些正是人类不断探索、社会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文明的标志。《论新石器时代原始崇拜所体现的先民创造精神》一文，深入探讨了原始先民的自然崇拜、鬼神崇拜、祖先崇拜与生殖崇拜出现的意义。这些原始崇拜的出现，表明原始先民的思维能力和思维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他们的认识水平和探索精神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新石器时代艺术的和谐乐观精神》一文，从原始先民对于动植物形象的塑造、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原始乐舞所表现的和谐乐观精神，深入探讨了新石器时代人们审美观念的产生与演进。文章均以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相互印证，有说服力，从中可以看出作者较宽阔的学术视野与较为深厚的文史功底。

第二辑5篇关于先秦文学的论文，以文学研究为主，主要论述了《诗经》中周族史诗的价值；孔子的贫富道德观及其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塑造；庄子的人格结构以及屈原和宋玉辞赋的特点。从中可以看出，作者不是就文学而简单地分析论述文学，而是将文学作品与作家置于更为宏观的历史长河中，用历史的眼光和哲学思辨的维度去把握与观照文学现象与文学作品，从而得出了比较客观的结论。

第三辑到第五辑，集中于《管子》的研究，但侧重点各有不同。第三辑4篇文章主要研究《管子》的文学价值与美学价值。《管子》的文学价值向来被学术界忽视，现行的几乎所有文学史、美学史著作很少涉及《管子》。在先秦诸子中《管子》的文体是最为丰富多样的。万兴同志将其分为论文体、问答体、经解体、记叙体、格言体等八类。这八类文体对后世的各种文体都程度不同地产生过深远影响。《论〈管子〉中桓管遗闻轶事的传记文学价值》一文，通过对记载桓、管遗闻轶事一组文章的深入分析，认为这组文章不仅具有传记文学的性质与价值，而且对后来的史传文学有直接的影响。《论〈管子〉的经解体及其特征》认

为,《管子》的经解体排比句多,对偶工整,音节性强,铺叙性突出。这种文体对韩非子的“储说”体,尤其是对韩非子的“解老”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观点无疑都是值得重视的。

第四辑主要探讨《管子》的学术思想。对于《管子》的学派归属向来有不同的观点与看法。《汉书》将其列入道家,《隋书》则列为法家;今人则有杂家、道法家、齐法家、稷下道家等说法。万兴同志认为,《管子》是记录与发挥管仲言行与思想的,“管仲作为功业显赫的政治家,开创了春秋五霸迭兴的一个新时期。作为一个新时期的开创者和著名的政治家,其建树是全方位的,其思想和功业自然不拘限于某一家”。因此,《管子》具有学术综合性。其中既具有法家思想、道家思想、儒家思想、兵家思想,更具有稷下黄老之学的特点。尤其是《〈管子〉中的〈兵法〉、〈幼官〉等篇关系考》,通过《管子》中的《兵法》《幼官》《七法》《参患》《地图》等篇的比较以及和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王兵》篇的比较,认为《幼官》等6篇,可能是《兵法》篇的错简窜入他篇,或错简之后误加篇名所致。先有《管子·兵法》,然后才有据《管子·兵法》以及其错简《参患》《七法》等摘抄而成的竹简本《王兵》篇。这些观点无疑都是值得重视的。这一辑对于《管子》学术思想的挖掘与论述是深刻的。

第五辑探讨《管子》的社会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这一组文章也有不少独到之处,例如,对于管仲的成功原因突破了传统的观点,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解释。

总之,这部书从文史哲宏观角度来把握与观照先秦文学与文化,具有一定的学术创新与开拓意义。略谈以上看法,与读者同志共商。

2014年7月25日于西北师范大学滋兰斋

目 录

第一辑

论旧石器时代中华远古文化的创造精神	2
从考古资料看新石器晚期社会的巨大变革精神	11
论新石器时代原始崇拜所体现的先民创造精神	21
论新石器时代艺术的和谐乐观精神	32

第二辑

两个民族 两种史诗	
——周族史诗与《荷马史诗》的比较研究	44
孔子的贫富道德观及其对民族性格的塑造	52
试论庄子的人格结构	60
屈原的“男女君臣之喻”与汉赋作家的女性人格	68
论宋玉赋的三大艺术构成	78

第三辑

论《管子》中桓、管遗闻轶事的传记文学价值	88
论《管子》的经解体及其特征	100
《管子》论说文的论证方法及其语言特征	109

论《管子》的虚静说及其美学意义	120
-----------------------	-----

第四辑

百家之总汇,子部之渊藪

——论《管子》的学术综合性	132
《管子》的儒家思想及其特点	138
论《管子》中黄老之学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及现实条件	151
论《管子》的法家思想	159
《管子》的治军思想浅探	171
《管子》中的《兵法》《幼官》等篇关系考	180

第五辑

从《管子》“三匡”看桓、管之间的君臣遇合	188
论《管子》的民本思想及其治国实践	198
论《管子》的和谐社会构建思想	208
后 记	218

第一辑

论旧石器时代中华远古文化的创造精神

早在一百多万年前我们的远古祖先就生活在中华大地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他们在漫长的岁月里群策群力,协同作战,艰苦奋斗,用勤劳的双手和聪明的才智,同恶劣的自然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漫长的斗争实践中,勤劳、勇敢、智慧的远古祖先们不仅发明与制造了石器、骨器与木器,发现与学会了使用火,而且在不断的探索中,逐渐出现了灵魂、宗教以及审美观念。这表明人类自古就具有艰苦探索、不断创新、谋求发展与进步的愿望。本文仅从民族的萌芽、墓葬出现与原始审美观念三个方面论述中华远古文化的创造精神。

一

人类在幼年时代无论男女老少都是赤身裸体的。《庄子·盗跖》就曾讲：“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炆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这些“知生之民”在脱离动物界的初期，其生活方面和动物并没有多少差别。在几十万、上百万年的漫长岁月里，原始人不但茹毛饮血，而且一直是赤身裸体的，也没有什么羞耻观念。但是，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聪明勤劳、善于思考与探索的祖先们在一次又一次的灾难面前逐渐学得聪明了，每到冬天便将剥下的兽皮披在身上以抵御严寒的侵袭。夏天虽然用不着御寒，但那当头的烈日也晒灼得皮肤极为难受，聪明的人类逐渐发现，如果躲到树荫下面就会感到凉爽、舒服多了。这样，人们在实践中逐渐地学会了将树皮、树叶串结起来披在身上，以防御烈日的暴晒。

夏天披上树叶树皮是非常简便而有效的措施，但冬天披上兽皮就不

那么简单与舒适了。如果兽皮不够柔软,寒风便可以吹及全身,人们仍然感到无比寒冷,无法外出生产与狩猎。所以,人们还必须进行艰苦的探索。在漫长的实践中,远古人类逐渐发现必须对兽皮进行加工使其柔软,然后还要将兽皮切割缀合与人体相称。要想将兽皮制作成简单的衣服,就必须用刀石切割掉不需要的部分,同时还须将不够的部分补上,量体切割兽皮。生活的需要促使人类不断地探索。于是人们在长期的制造石器等工具的过程中逐渐地学会了思考与探索,在反复的摸索与实践中不断地发明创造,终于学会了缝缀技术。

在我国,早在 18000 年前的山顶洞人遗址里就遗存了一枚 80 多毫米长的骨针。这枚骨针全身浑圆,针尖锐利,通体光滑,是刮削磨制而成的,其针尖是用尖状器刮挖成的。在四川资阳黄鳊溪出土的资阳人遗址里也发现了骨锥。这些骨针、骨锥的意义不仅在于说明了磨光和钻孔技术的发展,也不仅在于说明了当时的原始人已经能用兽皮之类的东西制作衣服,而且表明了当时人们的思维能力与制作技术有了明显的提高。

原始人由赤身裸体到穿上最简单的草皮树叶和兽皮衣服,这既是御寒的需要,也是思想观念的一个飞跃。据专家推测,山顶洞人时期血缘家庭关系已经逐渐地解体,作为族外群婚的普那路亚婚姻关系逐渐确立,氏族萌芽开始出现。山顶洞人时代已经排除了祖先和子孙之间、双亲和子女之间互为夫妻的原始婚姻状况。人类在穿上衣服之后,可能首先是将性器官遮蔽起来,这是排斥族内婚的社会需要,也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表现。

人类在制造衣服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并不懂得建造屋子。最初,原始人为了防止野兽侵袭,曾经像鸟儿一样居住在树上。所以《韩非子·五蠹》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构木为巢,以避群害。”《庄子·盗跖》说:“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在人类童年的时代,采取巢居树上的措施,也是一种伟大的发明和创举。当然,夏天暮宿树上是比较好过的,可是一到严寒的冬季,仍然巢居于树上就非常艰苦和困难了。原始人在不断的探索与实践中,充分发挥聪明才智,适应气候的变

化,从树上来到地上寻找适合的山洞居住。所以《礼记·礼运》说:“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人类居住在山洞里,一方面可以避御风寒,另一方面也便于自卫,保证自身的安全。考古发现,北京猿人居住的周口店就是石灰岩大山洞。从这里堆积层中的骨化石来看,证明北京猿人和野兽曾几次轮流地成为这个山洞的主人。在北京人居住的时期,洞穴堆积物达40米之厚,这绝不是短时期所能达到的厚度。北京猿人居住的洞穴和山顶洞人居住的洞穴是互相连接的。山顶洞人的洞穴在北京猿人居住的洞穴之上。当北京猿人住在这里时,山顶洞人的洞穴还没有因侵蚀作用而出现洞口。山顶洞人找到这个洞穴之后,从文化层堆积情况来看,他们并不是一直居住在这个山洞中,可能是人和兽在不断地争夺这个山洞,或者由于其他原因山顶洞人离开过这个山洞。此外,在河南安阳小南海也发现了距今13000年前原始人居住的洞穴。这里有许多动物的化石和打制的石器。

原始居民依靠着自然山洞居住,这在早期是一个进步。但是,随着人口不断增加和生产力的逐渐提高,这种围绕山洞生产、生活的方式便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特别是向农业与游牧业积极发展的部落,要求摆脱自然山洞的束缚更加迫切。因此,人类经过几十万年的艰难探索之后,到了原始社会晚期,农业部落基本形成,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人类才逐渐地离开山洞,到平原与丘陵地带居住,到河流两岸的台地上定居。

人类由巢居树上到穴居野处再发展到后来的定居平原、建造房屋,这不仅是人类居住条件的一种改善,也是人类思想认知水平与思维能力的一大飞跃。这表明人类逐渐地摆脱了自然界的羁绊,在不断的实践与探索中,不仅能认识自然界、适应自然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改造自然。于是,人逐渐地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者。居住环境与条件的改善,必然带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系列变化,进一步促进部落、氏族与家庭的产生与发展。例如,山顶洞人居住的山顶洞遗址分为洞口、上室、下室、下窖四个部分。上室文化层里残存不少文化遗物,底部遗物很少,约有60厘米厚的一层黑色土可能是人类长期居住留下来的。上室面积南北宽8米,东西宽12米。从室内遗迹的布局可以看出,这里显然是人的住处。下室遗

留有人类的三个头骨和一些躯干骨。在人骨的附近撒有赤铁矿粉粒,身旁还有人们佩戴的装饰品,这里看来是埋葬死人的地方。下窖没有遗留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只有脊椎动物化石,特别是食肉类化石较多。专家据此推断,山顶洞人猎获的动物可能除了食用之外,剩下的被储存在这里。这里可能是山顶洞人储存食物的仓库。山顶洞人虽然还是穴居,但这种洞穴内的配置是氏族公社的居住区、墓葬区、仓库等有规范的布置。这种布置只有在人类长期生活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之后才有可能出现。同时从山顶洞遗址内的配置,也说明这时人们已由过去较为松散、游动的群体发展为比较稳定的母系氏族公社了。这种配置也是后来氏族公社居住区域结构的雏形。

二

生与死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哲学的永恒主题之一。人类如何对待死亡,如何处置死去的同类,这些都是研究当时人类思想观念、文明程度和社会生活状况的重要内容。

人类早期对待死亡的态度是模糊不清的。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去迎接这件令人恐怖的事情,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处理死者的尸体。当时,人们穴居而野处,死者的尸体只能是弃之于野外,被鬣狗、秃鹰或者乌鸦等禽兽以自然的方式解决了,是彻底的“天葬”。这正如《孟子·滕文公》所说:“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这种随意处理尸体的情况,反映了在早期阶段人类的体制还较为原始,大脑结构简单,语言极不发达,思维能力较差,感情也比较淡漠。所以人死之后或弃之于野,或委之于沟壑。在食物缺乏的时候,甚至可能发生同类相残、相食的现象。如著名的周口店北京猿人化石,在2万平方米的堆积中,石器和动物化石混在一起,散布在15处,共代表了40多个个体。专家研究表明,这时不仅没有埋葬的习俗,而且据一些头骨上明显的打击痕迹推测,还可能

盛行着食人的风气。^①

葬俗作为人类文化的内容之一与文明程度的标志,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可能出现的。一般认为,葬俗的出现与人类思维的逐渐发达和原始宗教的出现密切相关,特别是与灵魂观念、祖先崇拜观念的出现有密切的关系。只有当人类进化到较为高级的阶段之后,随着体质的不断进步,特别是脑量的增加,人们的思维能力有了显著的增强。于是,长期受到自然力量压迫之下的人类,可能开始考虑诸如支配人类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力量究竟是什么?人类源于何处?人生的最后归宿究竟在哪里?在百思不得其解、力图摆脱自然的压力而又无法成功的情况下,于是人们将强大的力量想象成超自然的神灵,并认为自然界一切东西都是神秘而有灵性的,在膜拜神灵的活动中获取生存与发展的信心与力量。这样,原始宗教便产生了。

随着人类意识的复杂化和高级化,人们对自身的生理构造和某些精神活动现象感到困惑,并产生出灵魂观念,据此而对人的某些生理现象进行了解释。一是睡眠和做梦,以为是寓于体内而又独立存在的灵魂在起作用,睡眠是灵魂暂时离开肉体,做梦则是灵魂随处漫游。二是生病和死亡,以为生病是灵魂与肉体不能复合,死亡则是灵魂永远离开肉体。人们进而认为“如果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就没有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②。灵魂观念产生之后,又从灵魂观念中产生出鬼神观念,即人活着灵魂依附于肉体,死后灵魂离开肉体而成为鬼魂。《礼记·祭法》就说:“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其万物死曰折,人死曰鬼。”一方面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生命的可贵,感受到亲情的欢乐,产生出强烈的恋生、恋亲情结。既然灵魂是不死的,就希望亲人的鬼魂有一个固定的居所,并能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继续生活下去。另一方面,人们又相信能够离开人体而独往独来的鬼魂有着超凡的能力和神奇的力量,能够保护或者作祟于人类,由此而产生了恐惧和崇拜

① 贾兰坡:《远古的食人之风》,《化石》1979年第1期。

②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页。

心理。在这种灵魂观和生死观的交相作用下,便出现了埋葬死者的习俗,并通过埋葬死者来寄托生者的哀思。

中国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丁村人、许家窑人等还没有产生有意识埋葬死者的观念。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才有了埋葬死者的现象与意识。在山顶洞的下室,埋葬了可以辨认出来的三具人骨:老年男子、中年妇女和青年妇女。这三具人骨上和它的周围都撒有红色的赤铁矿粉末。另外,那位老年男子头骨左侧发现穿孔介壳、穿孔狐狸犬齿,这些无疑是随葬的装饰品。此外,随葬品还有用燧石制作的生产工具。这种有意识地将氏族死去的男女老少埋葬在一起,而且还埋葬了生产工具和装饰品的做法,不仅说明氏族成员之间的血亲感情,表现了生者对死者的拳拳之情,说明氏族成员之间联系的加强,他们之间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而且也反映了山顶洞人已经产生了关于灵魂和阴间的观念。他们认为人的肉体虽然死了,但他的灵魂却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去了,在那里过着同活着的人一样的生活。由此可见,迷信观念从一开始就是和社会实践密切关联的。迷信并不是脱离了社会的某个人的苦思冥想的结果。山顶洞人的葬俗以及随葬品的出现,不仅说明了那时人们已经有了原始宗教的观念意识,而且表明了人类的思维活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提升。

此外,山顶洞人遗址发现一件带有磨痕和刻纹的鹿角,这个鹿角虽然上部已经残断,只留下了主干部分。鹿角的另一分叉已被人工截去,而截断面被磨光,整个鹿角显然是被刮削后再加以磨光,然后在上面雕刻弯曲和平行的纹路。据专家推测,这件不平常的鹿角可能是氏族首领权力的象征。

三

审美意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在人类社会的初期,由于生产力极端低下,人类整天为觅食而奔命,手足胼胝,艰苦备尝,也只能勉强维持自身的生存。人类思维极不发达,对自身,对天地万物还

谈不上有多少了解。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还不可能产生爱美的观念,更不可能有审美活动。

人类追求美观以致有意识地去追求美,自然少不了这样几个最基本的条件:第一,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人们在获取食物、维持生存之外,有一定的剩余时间与精力。第二,人类的思维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对工具、器物的外表特征有了初步概念性的认识。第三,人类生产与生活的技术发展到一定的水平,能够使物体的外表特征有所改变,以符合某种美的要求和美的标准。考古发现,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制造工具只要求大致能够使用就行。而到了旧石器时代中、后期就不同了。人类在制造工具时不仅要求能用,而且逐渐地懂得讲求好用与好看了,后来还在工具上雕刻或涂绘各种装饰性的花纹。例如,在蓝田遗址、三门峡遗址等所发现的旧石器早期时代的石球,都只有一、二步加工,显得十分粗糙。而许家窑人制造的石球,通常则要经过反复多次地加工,这些石球的圆度达到了惊人的地步,这样做显然是为了美观。

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制造工具普遍追求既实用又美观的双重效果。在河南安阳小南海发现的石器,有尖状器、刮削器和石片等,不仅数量多,形制也复杂多样。还发现一件带孔石饰,显然有不少是经过对原料有选择和有意识地加工而成的。在山西朔县峙峪遗址中,发现了一件用水精制成的小石刀,轮廓像宽刃的小斧子,加工十分精致,器形周正对称,小巧玲珑,与刃缘相对的一边有一个小梗,是为了镶嵌木柄或者骨柄而专门打制的。湖南桂阳曾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骨锥,上面有刻纹,骨锥上加刻饰,显然与使用无关,而是为了装饰,就像现在人们在刀叉一类的工具柄上加花纹一样。峙峪遗址中也曾发现许多骨片,上面有刻划的痕迹,有专家推测,刻纹可能是原始的记事符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仅仅是具有美学的意义了。

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时代,石器和骨角器的形制不但更加多样化,而且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用途设计制造出不同的器具。这些工具已经出现了具有一定规则的形式,如长形、菱形、扁形、椭圆形等,而且在工具制造过程中,已注意选材、研磨,讲求色彩光洁。这和以前的不